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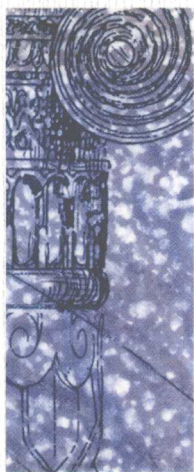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第9辑

Culture Studies Vol. 9

陶东风（执行） 周 宪 主编



# 文化研究（第9辑）

· 专题一 亚文化研究 · 专题二 粉丝文化研究 · 专题三 流行·性别·种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9辑

# 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陶东风(执行) 主编  
周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研究. 第9辑/周宪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97-1417-1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文化-研究-丛刊  
IV. ①G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708 号

## 文化研究 (第9辑)

---

主 编 / 陶东风 (执行) 周 宪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段景民 侯培岭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

字 数 / 37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17 - 1

定 价 / 4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文化研究》编委会

### 主编

陶东风（执行）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

### 编委

#### 国内学者：

乐黛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逢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王 宁 清华大学英语系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赵 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德胜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邱运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国际学者：

托尼·本尼特 英国开放大学

沃尔夫冈·威尔什 德国耶拿席勒大学

伊安·昂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阿里夫·德里克 美国杜克大学

约翰·哈特莱 澳大利亚昆斯兰科技大学

约翰·斯道雷 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

G. 默多克 英国拉夫堡大学

大卫·伯奇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

西蒙·杜林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徐 贲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

鲁晓鹏 美国匹兹堡大学

张英进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姜小凌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 • **Editors-in-chief**

Tao Dongfe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Zhou Xia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 • **Editorial Board**

Yue Daiyun, Peking University

Wang Fengz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Jin Yuanpu, Peopl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Gao Bingzho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Zhao B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Dai Jinhu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Wangning,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Chen Xiaom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Wang Deshe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Qiu Yunhu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Cao Weid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 •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Tony Bennett, Open University, England

Wolfgang Welsch,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 Jena, Germany

Ien Ang,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Arif Dirlik, Duke University, USA

John Hartle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John Storey,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G. Murdock,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England

David Birch,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Simon During, University of John Hopkins, USA

Xuben, St-Marry College, USA

Zhang Xudong,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Liu Ka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Lu Xiaop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Zhang Yingj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Micheal Kean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Jiang Xiaoling, Harvard University, USA

## 主编的话

文化研究最近几年在中国得到了切实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沿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继续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界的优秀成果，二是更加重视对中国本土文化现象（集中在当下和现代）的个案分析。比较遗憾的是，文化研究在本土经验研究和本土学术范式建构两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也就是说，对中国本土文化现象和经验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套用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术语，没有能够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升出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够在世界其他国家确立自己地位、被别人承认的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和术语系统。《文化研究》作为国内唯一一个专门的文化研究辑刊，目前所能够做的还是在介绍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同时，积极回应当下中国的文化现实。至于做得如何，则要留给学界同仁去做评价了。

《文化研究》对西方理论的介绍正朝专题化的方向努力。本辑我们做了“亚文化”和“粉丝文化”两个专题。做这两个专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和粉丝文化得到迅猛发展，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力军，对此的解释是摆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而急迫的任务。

亚文化专题选译了四篇文章。其中《亚文化、文化和阶级》选自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杰斐逊主编的《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该书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也是英国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文本。本文相当于该书的导言，主要包括了亚文化的界定、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文章的作者是约翰·克拉克、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和布雷恩·罗伯特，这一集体创作的特点也表明本文在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中具有宣言性质和纲领地位。伯明翰亚文化研究的最鲜明特点是强调亚文化的阶级属性，这一立场在此文中有集中体现。

伯明翰学派之前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流观点是习惯于用“青年文化”这个术语来突出青年的年龄特征及其与父辈文化之间的代沟,并集中于青年的音乐、风格、休闲消费等现象来界定青年。这种阐释模式就是所谓世代解释(generation explanation)模式。伯明翰学派认为这种阐释模式是在“混淆视听”,它掩盖和压抑了许多东西,如青年在不同阶级/阶层中的差异、青年文化的阶级基础以及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主导文化之间的联系等。霍尔等人主张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即结构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模式,认为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是阶级和社会矛盾的体现,亚文化与年龄有关,但这种联系不是最根本的;由于“青年文化”这个术语只具有描述意义,且意味着世代和年龄是最重要的,因此,伯明翰学派更愿意用建设性的亚文化概念来代替它,更倾向于根据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的联系,父辈文化与主导文化的联系以及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斗争来重新建构亚文化。亚文化并不仅仅与年龄有关,它具有复联性(double articulation),与父辈文化(如工人阶级文化)有关,也与主导文化有关。伯明翰学派虽然承认与父辈文化,即工人阶级文化相比,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具有差异性,但仍然具有父辈文化的阶级性,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它们终归是来源于父辈文化,并且继续在父辈文化中生存。就与主导文化或统治文化的关系而言,伯明翰学派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认为亚文化并不总是与统治文化公开冲突,有时与它共存,有时与它斗争、谈判。

文章的后半部分对工人阶级亚文化与资产阶级反文化进行了对比。虽然对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主导文化来说,亚文化、反文化都是另类的和抵抗性的,它们仍然有区别。简单的说,反文化(如嬉皮士运动、学生抗议运动等)是对主导文化采取的直接的、激进的政治对抗,而亚文化往往只提供象征性的抵抗。

谈到反文化及其与亚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及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英格的《反文化:乱世的希望与危险》(1982),本辑所选《反文化的衡量与根源》即出自该书之导论部分。在该书中,与伯明翰学派相似,英格也把反文化界定为一套与社会主导性规范和价值观尖锐冲突的价值观,属于一种宽泛的亚文化。作者对反文化的态度是宽容的,他认为,任何允许人类在几代人之后仍幸存于这个星球的文化,都必然已经吸收了大量反文化因素,容不下亚文化的社会是脆弱的,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它必然

显得僵硬和迟钝。选文部分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反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反文化的衡量；反文化的起源。

对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亚文化不能纳入反文化范畴，但反过来说，反文化是否该纳入亚文化范畴，则难以一概而论。不过，反文化与亚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反文化主要由它对主导规范的颠倒来界定，而这一特征在亚文化中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亚文化和反文化虽然都是不同于主导文化的新选择，不过，不应该用“另类的选择”来概括反文化；“另类选择”尽管是另辟蹊径，和正常的选择是殊途，但最后还是同归——归属于主导文化，而“反文化之路”指向的是另一个目的地——相反的目的地。

关于反文化的衡量标准，作者认为，由于反文化与主导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可以借助一些量表来衡量反文化。作者引用了“拉斯金-索塞量表”和“戈德温-谢利量表”，它们对于衡量逆反标准来说是很有用的。不过，作者也指出：反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属于反文化的，明天则不一定，反文化的出现，总会意味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变化。

分析反文化的根源时，作者主要考虑的是对人类来说反复或经常发生作用的四种根源：结构的与互动的根源（经济因素、人口学方面的因素、相对剥夺、孤独）、个人根源（本能冲动的自我、异化的自我和自恋、否定性认同、反认同或对立认同、否定性自我意向、矛盾心态等）、文化根源（主导性文化受到夸张的表现和直接的批判、社会紊乱、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仪式和深层象征的意义丧失等）、大众传播根源（电视录像、大众杂志和报纸、电影以及五花八门的地下印刷物在当代西方世界对信息的传播，使得人们得益于与过去直接交流，得益于对历代领袖和历史运动的再次发现和重新推崇）。这些根源综合起来，就酿成了一场场反文化运动。

伯明翰亚文化研究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一书，本辑的《自动点唱机少年和奖学金男孩》一文即选自该书。《识字的用途》是霍加特的代表作，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霍加特通过对早年生活的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社区日常生活（酒吧、工人俱乐部、报刊和体育运动等）进行的民族志式的回顾，展现了一种和谐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公共文化。第二部分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战后的新兴文化——霍加特称之为“既堕落、野蛮而又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大众文化”



生活”，众多的青少年和其他阶层的人沉溺于好莱坞式的大众娱乐所营造的超级幻象中，工人阶级的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霍加特把迷恋自动投币点唱机的青年人描写成“听从于机器的阶级”，是“没有方向、被驯服了的奴隶”，“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但又是消极的野蛮人”，对其进行了苛刻的批评。本文选译的“自动点唱机男孩”一段，就出自这一部分。

选文的第二部分是霍加特关于“奖学金男孩”的论述。这一段也跟青年文化有联系，不过很少被人提及。霍加特出生于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之所以后来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并取得突出成就，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霍加特曾经是“奖学金男孩”。他和其他奖学金少年走出了自己狭小的环境，也一起经历了英国社会整体的变迁，比如政体的非殖民化、消费社会的形成和大学的普及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霍加特这代人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人文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内心时刻忘不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因而会有很多的困惑。霍加特根据亲身经历描写了这一特殊青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揭示出这种青年文化的无根、断根和无归属感本质。应该看到，霍加特的论述仍拘泥于对这一文化现象的阶级分析，未发掘出青年们的反抗特质，对现状的摹写多于对出路的探寻。虽然如此，霍加特的揭示对研究青年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关注青少年，关注他们的服饰、语言、发型、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关注其认同感、归属感和精神特性，关注他们如何表达自我，并分析各种青年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存在的层次及其社会意义。

安东尼奥·E. 阿斯提纳克斯的《西阿提卡地区铁杆球迷亚文化——对主要研究成果的分析》考察了希腊雅典西郊铁杆球迷及足球流氓的社会性特征、社会组织类型和亚文化模式。此文既借鉴了伯明翰的亚文化研究成果，同时也试图与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阶级概念的陈述。性别、阶级和种族近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人文学者最关注的议题，它们甚至成了“文学批评领域的圣三一”。但社会学者在使用“阶级”一词时，显然比人文学者更加谨慎。本文作者在研究中就“选用了—一个关于阶级的多维化概念”，包括收入、所从事的生产关系类型，以及文化资本和政治权力等三个方面的参数。这一阶级概念既是“对马克思式和韦伯式理论的综合运用”，又“受到了达伦多夫和吉登斯著作的影响”，可谓是煞费苦心。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例证，作者只能证明“大雅典郊区的足球流氓主义是一种工人阶级现象”，但

却无法“更为明确地说明铁杆球迷到底来自工人阶级内部的哪些阶层和团体”。而学界争论的关键恰恰就在于，足球流氓到底是来自一般的工人阶级，还是来自工人阶级中更暴力的阶层？

其次是作者对四个铁杆球迷团体的组织模式和亚文化风格的细心甄别。如在描述“游击队员”这个团体时，作者在其符号实践中确认了“四个关键过程：口头交际、非口头交际、个体或集体的风格化表达以及整体的戏剧化或舞台式情景”，并以此为基础剥离出了该组织的基本象征符号的四种类型——战争、爱情、生命和死亡。作者又根据“真诚者”成员的活动特点，归纳出了六种亚文化模式，还把“彩虹”团体和山区乡村摇滚亚文化联系在一起。但与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显著不同的是，社会学者更多地把亚文化看作是一种“出轨”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对有权者和被迫处于臣属地位的二等公民之间的根本冲突的表达，当然也不会把它看作是对主导文化的一种“抵抗”。

第三是作者对足球流氓成因的解释。作者列出的第一个主要因素是社会边缘化以及文化剥夺，这导致了一部分工人阶级青年团体在认知、情感及交际——也就是符号方面的困难，特别是他们在构建、阐发表达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特定情感、认知和语言模式时，有些困难。这种文化剥夺与通过身体的暴力所表达的绝望和自暴自弃的感觉相关。

我们的另一个专题是粉丝研究。至少在大陆，“粉丝”是一个新近流行的术语，虽然粉丝不是新近出现的群体。我们以前所谓的追星族大概就是现在说的“粉丝”。“粉丝”这个术语的流行应该和超女选秀节目密切相关，这也暗示了粉丝文化研究和青年亚文化研究之间所存在的亲缘关系。随着追星族摇身一变成为粉丝，对追星现象的情绪化、道德化的批判，也逐渐转化为更加理性化、学术化的“粉丝文化研究”。

本辑所选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解读文本来尝试、检验、反思或者建构一种研究方法，体现作者的理论意识。这种理论我称为“在地的理论”。

由于粉丝文化的独特性和粉丝社群的相对封闭性，源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成了粉丝研究中的一种主要方法。1992年出版的两部粉丝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和贝肯—史密斯的《进取的女人们：电视粉都和大众神话的创造》，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绝不只是一种巧合。当然，他们二人的研究路径并不完全一样。贝肯—史密

斯作为粉丝群的“外来者”，试图在资深粉丝的引导下逐渐深入社群。在其民族志的探索中，她将自己定位为普通读者和一个神秘社群之间的中介。詹金斯则是以学者—粉丝的双重身份来研究粉丝群，他的自我定位是粉丝社群的一员，一个保持一定批判意识的圈内人。这种定位更能获得粉丝群的信任和支持，并拥有一些局外人所没有的洞识。

本辑选择的卡密尔·贝肯—史密斯的《受难和慰藉：一种关于痛的文类》出自她的《进取的女人们：电视粉都和大众神话的创造》一书的第10章第1节和第3节。该书论述的是一个围绕《星际迷航》《布莱克七人组》和其他动作冒险片组成的媒介粉丝杂志社群。这个社群的成员基本上是女性，主要从事粉丝小说的创作。虐—慰小说是她们创作的粉丝小说中的一个类型。本文展示了民族志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

民族志学者最常用的研究手段就是询问，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错误的提问方式只能让研究者一筹莫展。在本文开始，贝肯—史密斯首先以局外人的身份提出了她个人对虐—慰小说的疑惑：为什么会有粉丝喜欢创作、阅读这样充满暴力内容的小说？尽管她在粉丝社群中的“线人”和部分社群成员都对她的问题做出了解释，但贝肯—史密斯对她们的回答并不满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文类，贝肯—史密斯对一个她最喜爱的虐—慰故事进行了反复阅读，并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叙事特点。随着她对这一文类的了解逐渐增多，贝肯—史密斯调整了研究方向，她不再询问粉丝为什么喜爱这个文类，而是问她们在写作虐—慰故事时，有什么特别的生活经历。通过挖掘粉丝的创作过程，贝肯—史密斯才最终发现了这个文类对于粉丝社群的真正意义。

我们选择的另一篇文章，麦特·西尔斯的《在“知识”与“辩护”之间的粉丝文化》出自西尔斯的《粉丝文化》一书的第3章，它同样也是探讨粉丝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的，而且可以看作是与贝肯—史密斯的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对话。为了摆脱粉丝民族志的局限，西尔斯提出了自体民族志的概念。他不仅分析了四个自体民族志的样本，还以自己的粉丝经验为例，书写了他个人的自体民族志。

西尔斯首先对以贝肯—史密斯和詹金斯为代表的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西尔斯认为，贝肯—史密斯的人种志研究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她采用受众访谈的方式，假设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能够用语言和话语来

解释。实际上，粉丝对研究者问题的回答大多是采用粉都内部流通已久的话语资源，带有强烈的自我辩护的性质。其次，贝肯—史密斯的人种志的叙事结构与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很类似。作为一个非粉丝，她像福尔摩斯那样进入粉都内部，刺探、挖掘真相，粉都则经常故意将研究者导入歧途。当然研究者最终还是成功地走出了迷宫一样的粉都。西尔斯认为，贝肯—史密斯把研究者和粉丝对立了起来，研究者是英雄，粉丝则是受害者。詹金斯虽然以粉丝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书写了《文本盗猎者》这部粉丝民族志，并把粉丝再现为胜利者，但其研究的焦点依然是单一的粉丝文化。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程度地迷上多个文本或对象。如何处理粉都的这种多样性依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关于自体民族志，作者指出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不完全的清单，清理出文化和历史进程在自我沉积下的‘无数痕迹’”。但自体民族志与女性主义的“私人的也是政治的”口号是有区别的。西尔斯接下来审视了费斯克、布克特曼、怀兹和沃尔夫等四位学者——粉丝的自体民族志，并比较了每一个自体民族志的优点和局限，最后提出了自体民族志的四个关键原则，并依照这个原则书写了他个人的自体民族志。

不过，这篇论文的观点也有可商榷处。首先，关于粉丝的自我辩护。毫无疑问，部分粉丝确实是在利用社群中流传的“话语真言”为自己的粉都做辩护，但也不能排除还有一些粉丝能够主动地、而非被动地思考、反省个人的爱好。剥夺粉丝解释自己粉都的权力，贬低粉丝解释的价值，只能加固而非消除粉丝和学者、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其次，西尔斯对自反性的强调和对“真相”的无穷拷问，让人怀疑自反性是否只是学者的自恋情结的学院体表达？在对学院的“批判工业”做出了例行公事的指责之后，他是不是就更能自由地沉溺于“严谨的”智识操练？

在消费文化研究中，生产—消费的“断裂”理论与品位—阶级区隔理论影响广泛。但伊恩·康德里的《B-Boys 和 B-Girls：日本的饶舌粉都和消费文化》则从粉都的角度研究了日本当代消费文化，并对上述两种理论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流行文化出现了两个大的发展趋势：一个是流行文化日益增加的大众化，“超级全球流行现象”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多；另一个是新媒介技术使得小规模文化生产变得更加方便，大量“御宅族”社群应运而生。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人类”（“泡沫经济时代的炫富式消费者”）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的“御宅族”是媒介

时代的消费专家，他们对主流社会的文化资本完全无动于衷。这两个趋势直接导致了消费意义的重组。以此为基础，康德里分别对“断裂说”与“区隔说”提出了质疑。“断裂说”的拥护者丹尼尔·米勒认为，消费者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作为现代性标志的断裂状态，因为成为一个消费者就是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堆非自我创造的物品和影像当中。但康德里则认为，在当代社会，消费别人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导致断裂感，更多的是导致一种因可选择的东西太多而无法确定什么才是最佳选择的绝望。随着消费和生产的界限日益模糊，消费（购物）可以是一种赋权性的生产活动，消费者也可以成为生产者。如饶舌粉都的DJ就将他们收藏的唱片用作演出的材料。

区隔说是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提出的，其核心是认为文化商品的品位是一种阶级区隔的标志。康德里指出，日本当代的文化消费已不再具有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所发现的结构社会的功能。由于越来越多的粉丝占据了相对独立的“岛宇宙”，他们的文化实践对于局外人来说都相当晦涩难懂，因此人们看到这些实践时既没有优越感也没有自卑感。文化消费也就不再可能是阶级地位的标志，只能是一种个人趣味。

本辑还选译了琳·托马斯的《受众研究导论》（选自其《粉丝、女性主义和“高质量”媒介》一书的第3章）和洽德·戴尔的《“瞧，那个大块头！”——颠覆性快感、女性粉都和职业摔跤》。前者详细陈述了她对《阿切尔一家》和《神探莫尔斯》这两部肥皂剧的粉丝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一位西方学者严谨到“琐碎”的分析方法和处处自我反思的学术态度。这篇“如何做受众研究”的文章或许能对国内的受众研究、粉丝研究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实地”指导作用；后者利用布迪厄、巴赫金、德赛都等人的理论，探讨了二战后美国职业摔跤运动的女性粉都异军突起的原因，展现了粉都、性别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相信读者读后均有启发。

粉丝文化的专辑还发表了杨玲的《“弄弯的”罗曼司：超女同人文、女性欲望与女性主义》，杨玲是国内少数几个以超女粉丝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年轻学者，本文就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所谓“超女同人文”，是超女粉丝创作的以超女之间的虚构爱情为主题的同性情爱小说。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均以超女为原型，并使用她们的真名。本文以百度绯色超女吧的著名小说《绯色事》为例，解读超女同人文中折射出的女性欲望，并分析了这一文类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本辑《文化研究》的最后一个专题是“流行、性别、种族”，全部是国内学者所撰。其特点是通过对流行文化特别是影像文化的细致解读，揭示其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作者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性别权力维度或种族权力维度，把各维度综合起来，这是因为，在众多的流行文化文本，特别是那些涉及跨文化表征的流行文本中，常常是性别权力、种族权力等不同的权力类型均在其中发挥作用且相互交织，这就决定了单一的权力分析角度是不够的。

李渝凤的《在后殖民语境中重读好莱坞电影中的李小龙传奇》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小龙在电影界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李小龙现象”，掀起了一股强劲持久的“功夫热”。然而，与其在亚洲电影市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位功夫巨星生前在好莱坞备受冷遇、默默无闻，而死后却成为好莱坞话语里被其电影机器反复和蓄意利用的一个符码。原因何在？本文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视角，以罗伯·科恩执导的《李小龙传》（1993）为典型文本，追溯李小龙的好莱坞寻梦之旅，揭示“死亡芭蕾”功夫电影的“奇观性”和“异国情调”，并借鉴爱德华·萨义德、詹姆斯·克里福德、霍米·巴巴等文化批评家的理论，从文化身份、权力关系的动力学、他者的再现以及殖民话语的构建等几方面，探究李小龙符码的深层文化含义，破解好莱坞电影中的李小龙神话和传奇，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在结语部分，作者提出，当今的文化学者应思索如何真正地理解文化差异，并着力寻求一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以使徘徊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属下”能够说话，能够真实地再现自我。

吴娜的《论加籍华人的双重文化存在：解读〈双重幸福〉》通过解读电影《双重幸福》提出了如何把握加籍华人文化身份的问题：他们（加籍华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还是来自中国的加拿大人，抑或就是纯粹的中国人、纯粹的加拿大人？或者他们既都是也都不是？他们究竟应归属于哪个现存的文化群体？他们又希望归属于哪个文化群体？他们的语境是丰富还是匮乏？他们的文化存在将走向何方？由于加拿大中国移民的文化身份总是镶嵌在不定、脆弱和无形的复杂话语中，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追寻是颇具挑战性的，也是撩人不安的。由加拿大国家电影部出版发行、从香港移民温哥华的米娜·萧（Mina Shum）自编、自导、自演的《双重幸福》令我们深思这些问题。本文借用当代文化学理论，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解读这部描述当代加拿大中国移民生活的电影，

论述加籍华人的双重文化生存状态,探讨加籍华人的双重文化生存的本质内涵,分析不同时代加籍华人对其传统文化和移民地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剖析其文化身份的重建,探究“文化第三存在空间”的建构可能性。

丁少彦的《意义之狂欢:试探讨美国杂志广告中女性身份的复调现象》以斯图尔特·霍尔关于文化政治的“论辩”策略和女性主义学者尤丽丝·巴特勒的性别“引用”理论为基础,质疑了认为女性身份被动地由社会文化绝对构成的观点,肯定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女性创造自身身份的能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2002年的美国杂志广告中有别于权力话语的各种“杂音”,即女性形象再现中出现的变化、进步和种种新元素,认为这是女性为自身创造的反叛性的社会身份,从而也证明了本质主义性别身份定义的乌有性。

彭保良的《“销售欢乐”与意识形态——解构迪斯尼化的性别》指出,迪斯尼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为它赢得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既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又给观众送去了欢乐。迪斯尼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一方面,在后现代的美国,超现实大行其道,使得物资和符号、现实和模仿以及自然与文化等关系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媒体又乘虚而入,以强大的操纵能力把人们引入一个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真(现实)假(模仿)不辨的世界里,赚钱就变得非常容易。因为人们不再关心真实性,满足感官即可。所以,迪斯尼以销售欢乐牟利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文通过研究迪斯尼电影中的性别问题,证明销售欢乐是意识形态使然。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里编织了一张无形的霸权巨网,把一切都纳入它的控制之中。所谓性别化的身体、服饰、社会角色等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本文致力得出的结论是:迪斯尼能成为一个王国,意识形态控制是它立足的根本。

相比于前面这些论文,毛思慧的《当代中国后殖民文化研究所面临的两种挑战:认知上的“考古工作”和实践上的“野外作业”》更富有理论性和思辨性。文章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似乎日益开放、文化传播速度急剧加快、虚拟言说空间不断扩展的今天,后殖民批评除了继续探讨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理论进行认知上“考古”工作式的梳理外,也应该关注国内的各个民族间的话语—权力关系,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文本扩展到国内同样复杂的文化表征世界,并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野外作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我们中国各民族、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存状态及心理空间的研究上。在汉语(或

“普通话”)日益成为绝对霸权式语言的今天,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民俗传统的整理、抢救和发展,对城乡弱势群体生存空间和言说权利的关照,不仅应当成为我们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的思想和文化上的挑战。

最后,我要郑重推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曼的文章《欧洲人东方想象的历史条件——以中世纪东西方香料贸易为中心》。虽然作者自谦地说此文是对中世纪欧洲人有关一些物品种类的稀少与丰盛的概念如何驱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考证”,但却绝对不乏理论的深刻性。作者将论述的焦点放置于商业文化往来和传奇故事支配下的东方想象,以此视角来阐明被欧洲人看作奢侈日需品的胡椒以及其他香料的东西方贸易往来是如何左右了过去千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毋庸置疑的是,中世纪欧洲人日益膨胀的对新奢侈品的需求,某些日常所需品在欧洲的稀少罕见以及中世纪欧洲的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对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充分揭示了欧洲人的东方想象所导致的海外扩张行径的根源所在。文章史料极为丰富,读来既興味盎然,又令人深思,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历史学家的魅力。



# 目 录

主编的话 ..... 陶东风 / 1

## 专题一 亚文化研究

亚文化、文化和阶级 ..... 约翰·克拉克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布雷恩·罗伯特 / 3

反文化的衡量与根源 ..... 弥尔顿·英格 / 23

自动点唱机少年和奖学金男孩 ..... 理查德·霍加特 / 67

西阿提卡地区铁杆球迷亚文化  
——对主要研究成果的分析 ..... 安东尼奥·E. 阿斯提纳克斯 / 82

## 专题二 粉丝文化研究

受难和慰藉：一种关于痛的文类 ..... 卡密尔·贝肯—史密斯 / 103

在“知识”与“辩护”之间的粉丝文化 ..... 麦特·西尔斯 / 113

B-Boys 和 B-Girls：日本的饶舌粉都和消费文化 ..... 伊恩·康德里 / 144

“瞧，那个大块头！”  
——颠覆性快感、女性粉都和职业摔跤 ..... 洽德·戴尔 / 171

受众研究导论 ..... 琳·托马斯 / 194

“弄弯的”罗曼司：超女同人文、女性欲望与女性主义 ..... 杨 玲 / 214